

从斯密到杨小凯:内生比较优势理论起源与发展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王元颖

[摘要] 本文以内生比较优势为线索,对国际贸易理论进行梳理,认为斯密、汉密尔顿、李斯特、克鲁格曼、杨小凯等贸易理论,虽然时代不同、观点各异,但其主旨都在于倡导内生比较优势的培植与创造。据此,内生比较优势对于转型经济——中国尤为重要,在未来发展中,只有通过分工、专业化、规模经济与市场份额的拓展,形成内生比较优势,中国才能走出“产业结构低度化”的外生比较优势陷阱。

[关键词] 内生比较优势,外生比较优势,分工,专业化,规模经济

内生比较优势理论*,最早起源于斯密的《国富论》(1776),而1791年汉密尔顿《关于制造业的报告》所阐述的关税保护理论和1841年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所推崇的幼稚产业保护论和生产力等理论发展了内生比较优势理论。在当代,克鲁格曼的国际贸易新理论和杨小凯的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使内生比较优势理论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其主旨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一直按照外生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的话,就会陷入产业结构低度化的“比较利益陷阱”。为此,本文拟对内生比较优势理论进行梳理,以期对我国贸易政策与发展战略有所启示。

一、斯密绝对成本理论:内生比较优势理论的起源

亚当·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阐述了绝对比较优势(或绝对成本)理论,这标志着内生比较优势的起源。斯密认为:国富的源泉在于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分工与专业化可以形成内生比较优势,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因为分工和专业化可以:①节约劳动转换时间;②发明新的生产工具;③通过“干中学”,

员讨论,使其清楚了解该次审计的目的。一般的,大部分审计目标都旨在验证每一项内部控制及其有效运作的程度,看各个内部控制目标是否实现。第二步,了解所要审计的单位或领域,尤其是新的或特别复杂的单位或领域。风险评估是这一步骤的重要工作,通常包括被审计单位的先天固有风险和可察觉风险。第三步,编制审计计划和审计进度表。当审计目标和可能的审计风险都明确后,即可确定审计范围、编制审计时间预算、人员的分工等。第四步,收集并记录现有控制情况。审计师首先要熟悉各个营运部门应该具有的控制,然后可以用流程图等方法对被审单位的内部控制进行描述。第五步,检验现有控制的可靠性。首先要设计适当的检验程序,并在审计计划中作清楚的说明,包括详细的审计步骤、进行控制测试的目的,以及如何针对个别控制加以检查。第六步,比较实际控制系统与理想控制系统,找出遗漏的控制。比较可以分阶段进行。首先,用公司政策、经营守则、会计准则、政府的法律法规等作为标准,来评判实际控制系统是否适当;然后,再用内部控制标准、行业公报、审计理念、审计师的知识与经验对实际控制系统的适当性进行评估。第七步,评估控制系统。当审计师发现内部控制的缺陷之后,他们应决定这些发现所带来的影响。管理审计师应以管理者的高瞻远瞩和成本效益原则为基础来评估内部控制系统。第八步,提出审计报告。审计报告应涵盖审计全过程,每份报告应包括:审计的发现、潜在的问题、被审计单位对审计师的发现及意见的答复,根据其答复,即可形成整体的结论。

三、开展内部管理审计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

1、建立内部管理审计的准则体系。制定内部管理审计准则,可以借鉴财务审计准则的有关内容,其制定机构可以成立注册管理审计师协会,来专门负责管理审计的职业管理。

2、确立内部管理审计的周期。目前,我国的内部管理审计工作可以每两年进行一次,而且应当将审计工作分散在平时,分期分批的进行,以便避免审计工作过分集中。这样也便于发现问题,及时提出改进意见,促进管理水平的提高。

3、建立管理审计师考核或考试制度,形成高素质的管理审计师队伍。在我国很多企业虽然建立了内部审计机构,但由于内部审计机构的人员整体素质不高,还不能完全胜任内部管理审计工作;另一方面,从事民间的审计工作的注册会计师,大部分是会计方面专家,但管理知识掌握较少,也不能单独从事管理审计工作。作为过渡的做法,我国内部管理审计人员可由注册会计师和管理专家共同组成。但从长期来看,可以建立管理审计师考核或考试制度,形成专门从事管理审计的管理审计师队伍。

4、健全管理原始记录和管理审计档案的保管和查阅制度。为了明确责任,强化管理,企业应当建立经济活动和经济管理工作的原始记录制度,并确保贯彻执行。承担管理审计工作的机构,应当妥善保管有关文件资料,以便日后查阅和检查。

5、提高内部领导层的管理意识。虽然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内部管理审计已经成为内部审计的主流,但内部管理审计在我国才刚刚起步,还属于一种新生事物,人们对它还不十分了解。长期以来,在我国重财务、轻管理的思想还十分普遍,很多领导还没有认识到或没有完全认识到科学管理对企业长期生存、发展的意义,管理意识淡薄。所以要想在企业内部开展管理审计,必须提高领导层的管理意识。

* 内生比较优势,即后天通过努力而形成的比较优势;而外生比较优势,则是天生的比较优势。

提高劳动熟练技能。而国际分工则主要具有以下利益:①专业化提高生产技能;②要素在最佳状态组合,发挥最大效益;③节约劳动时间,提高产品品质,增强产业竞争力。所以,依据内生比较优势和绝对比较优势的原理,斯密主张各国应根据其优势条件,生产其成本最低、最有优势的产品,以发挥其绝对优势(absolute advantage),并与其他国进行分工与交换,贸易结果会对双方都有利。据此,斯密主张自由贸易,反对重商主义,主张“看不见的手”对经济的自动调节,反对国家对贸易的干预,包括征收关税、发放补贴等。在斯密的绝对比较优势理论中,一国不论其初始条件如何,都可以通过分工和专业化来提高其劳动生产率,从而创造出内生比较优势来。

二、贸易保护理论:内生比较优势理论的发展

汉密尔顿(Hamilton, 1757~1804)是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始祖。他于1791年12月向国会递交了《关于制造业的报告》,强调要用保护关税政策来促进美国幼稚产业的发展。在报告中他着重阐述了为何要保护发展制造业以及如何保护的问题,并提出了以加强国家干预为主要内容的一系列保护制造业的政策措施:①保护关税。②限制重要原料出口,以免税等手段鼓励国内急需原料的进口,保证制造业投入要素的供应。③限制国内先进设备的输出。④政府以津贴、补助奖励出口,以贷款等形式鼓励生产经营者。⑤建立联邦检查制度,保证制造业质量等。汉密尔顿的贸易保护政策不仅对于当时美国工业的发展和经济实力增强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且至今对于发展道路的选择、制造业的发展、幼稚产业的保护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是近代贸易保护理论的代表,在1841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他集中阐述了贸易保护理论与幼稚产业保护论。李斯特的主要观点有:①生产力理论。他认为,无论对一个国家或一个人来说,其财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生产力,即财富的创造与再生产能力,即内生比较优势的创造能力。②关税保护阶段论。李斯特认为,从经济方面来看,每个国家都必须经过如下发展阶段:原始未开化时期、畜牧时期、农业时期、农工业时期、农工商业时期。与其相适应,各个阶段应实行不同的关税与贸易政策。在原始未开化时期、畜牧时期、农业时期,应实行自由贸易与低关税政策。在农工业时期,宜实行贸易保护与高关税政策。而到最后一个阶段,即农工商时期,又宜实行自由贸易与低关税政策。即随着时间推移,关税的变化呈倒“U”型曲线,贸易政策为“自由贸易——贸易保护——自由贸易”。③国家经济学。从国家经济学角度出发,自由贸易只对英国这样的工业成熟国家有利,像当时德、美此类欠发达国家,则应实行贸易保护政策,而不是流行学派的自由贸易政策。这一理论对后来的发展中国家包括现今的中国开展对外贸易都有较强的指导作用。④幼稚产业保护论。李斯特认为,幼稚产业保护论的根本目标在于通过国家干预和保护关税,促进幼稚产业的成长,提高一国的生产力。至于如何保护,要区分从量关税和从价关税、保护关税和收入关税。关税保护应为温和的、渐进的保护。即随着时间推移关税变化呈倒“U”型曲线。但是,幼稚工业的幼稚只是暂时的,必须具有潜在的优势与成长潜力;如果其长期幼稚,则不应保护。保护的期限最高不超过30年。可见,“幼稚产业”应是未来的支柱产业,具有潜在的发展优势与较强的产业关联度,它们的发展能够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不过,关税保护只是暂时的手段,发展才是目的。实际上,李斯特的四大理论:生产力理论、关税保护阶段论、国家经济学、幼稚产业保护论归结到一点,就是内生比较优势理论。生产力理论与国家经济学说明了内生比较优势创造的重要性,而关税保护阶段论与幼稚产业保护论则阐述了如何创造内生比较优势。

在李斯特之后,凯里、旭雷、孟路赖斯库各自从不同的角度,发展了李斯特的生产力与贸易保护理论,从而使内生比较优势理论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凯里在1859年出版的《社会科学原理》中发展了李斯特的贸易保护思想。他以“多种经济”的国家为理想,主张每一个国家应致力于一切部门的经济活动,并在阐释被保护工业对农业好处的基础上,把贸易保护的范畴从工业扩展至农业。可是,自给自足,多种经济如果过度,势必走向“闭关自守”,把本国排除在国际竞争、国际分工与协作之外。从世界经济来看,会形成“大而全、小而全”的世界产业布局,不利于各国比较优势的发挥,也阻碍了国际分工与合作。20世纪初,旭雷进一步发展了李斯特的国际经济学理论,认为一国贸易政策的选择应从国家利益出发,而不应仅考虑消费者或生产者一方的利益;实行自由或保护贸易政策要从国家利益出发,看其实施后果。旭雷的理论局限性在于,只以静态的观点来看待国家利益,未把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综合考虑。因此,其国家利益概念是不完善的。孟路赖斯库认为,一国经济发展,必须逐渐提高全国生产力水平,然后国民财富才能增加。一国是否应生产某种产品,是否应保护某种产业,应以其是否能提高本国的净生产力为原则。利用贸易保护政策,逐步提高落后国家的平均生产力水平,是发展中国家维护其本国利益并逐步摆脱落后的重要路径之一。否则,如果只按照相对比较优势、绝对比较优势或要素禀赋理论去参与国际分工,那么落后国家就会永远处于“低水平分工”陷阱,无法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

三、IPEP假说:内生比较优势理论的模型化与实证检验

IPEP(import protection act as export promotion)假说属于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范畴。其基本研究框架为:①SCP范例,厂商如何对贸易政策引致的市场结构作出反应;②精心选择的报酬递增产业风格化的贸易政策刺激;③静态规模经济等。Dick(1994)提供了一个检验IPEP假说的框架。借用产业组织SCP范例,验证进口政策如何通过提高国内公司的出口绩效来改变产业结构。这个框架把假说推广到最近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理论——进口替代可以充当报酬递增产业的出口促进。假说背后的经济逻辑是:进口品征税代替国内市场的外国产品的国内征税,相对产出量的转变促使国内厂商下移他的边际成本,并伴随着公司的边际成本上升。为了降低国内厂商的相对成本,它利用静态规模经济、干中学效应和R&D密集,在国内和未保护的国外市场扩展其市场份额。通过这种方式,一个市场的进口促进成为其他市场的出口保护。IPEP假说建立在以下三个隐含假定之上:(1)进口保护导致国内产量增加;(2)产量的增加降低了这些厂商的边际成本;(3)边际成本的下降导致国外市场份额的增加。如果这三个假定不成立,假说将不成立。经过回归分析的实证计量检验,在美国全部的进口竞争产业或具有最强的报酬递增的产业,都很少发现假说的支持。因此,Krugman对IPEP假说提出了有力的批评,其国际贸易新理论是对IPEP假说的进一步发展。尽管IPEP假说还不完善,并遭到了诸多批评,但是其对内生比较优势在当代的发展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四、国际贸易新理论、市场结构与内生比较优势理论

(一) 克鲁格曼国际贸易新理论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以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为前提,克鲁格曼国际贸易新理论(1990)把产业组织理论引入了国际贸易领域,改变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前提。把不完全竞争、规模经济、报酬递增等引入到国际贸易理论中,使国际贸易理论更贴近于现实,从而形成了国际贸易新理论。他还把新政治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引入到国际贸易理论,从而形成了战略性贸易政策与新国际经济学。通过保护性关税、进口配额、VER等战略性贸易政策,可以改变传统国际贸易的产业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的状态,通过内部规模经济、外部规模经济、干中学效应实现报酬递增,形成某种垄断优势,以便更好地在国内和国外市场拓展市场份额,参与国际竞争,从而一国通过战略性贸易政策培植起本国产业的竞争优势,即创造出一国的内生比较优势。实际上,克鲁格曼的国际贸易新理论以及战略性贸易理论与汉密尔顿的保护关税论、李斯特的幼稚产业保护、国家生产力理论是一脉相承的:保护只是手段,培植一国的生产力才是目的,保护是为了更好的竞争,是为了内生比较优势的创造和培育。如果一国永远按照要素禀赋优势进行生产与分工,那就会类似陷入“荷兰病”的“比较利益陷阱”,在国际分工的产业链上,只能永远处于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的下游。随着国际区域经济的“极化效应”的加深,落后国就会陷入“贫困的恶性循环”。所以,克鲁格曼国际贸易新理论对落后国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虽然,克鲁格曼本人是一个自由贸易者。

(二) Helpman 与 Krugman 对市场结构与对外贸易的分析

传统的贸易理论是以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作为假定前提,并以要素禀赋的差异作为贸易得益的唯一来源。Helpman 和 Krugman(1985)把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引入贸易理论,强调市场结构对国际贸易的重要影响,把分工与专业化形成的规模报酬递增作为贸易得益的重要来源,由此更好地解释了贸易问题。传统的要素禀赋差异形成的是产业间贸易,而专业化的规模报酬递增则形成了大量的产业内贸易。并且,从当今世界来看,产业内贸易的数量大大超过产业间贸易。据此,要素禀赋差异与规模报酬递增均是国际贸易收益的重要来源。而且,分工与专业化形成的规模报酬递增,可以使产业在市场与生产上形成某种程度的垄断力,在SCP的框架内,对贸易利益的创造与分配将产生重要影响。在国家间贸易的起因上,其认为,如果有国家特有的规模经济,即基于要素禀赋优势的规模经济,这种贸易不存在谜团。这种贸易即是基于外生比较优势的国际贸易。但即使要素报酬或技术差异并不形成对专业化和贸易的诱因,规模经济仍能导致各国实行专业化并相互贸易。这种贸易即是基于内生比较优势的国际产业内贸易。换言之,即使各国不存在要素禀赋差异,而是具有相同的要素禀赋,专业化和贸易仍会继续存在,而这种产业内贸易有别于传统的产业内贸易。所以,不完全竞争和报酬递增为产业内贸易提供了一个简明的解释。“显然,为实现规模经济而不是因为要素报酬的差异而进行的专业化毫无疑问能使有相似要素含量的商品实行双向贸易。”*而各国的要素禀赋越相似,基于报酬递增的产业内贸易就越重要。而在当今世界,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很大部分属于产业内贸易,而在当今世界经济中,这种“北北贸易”大大超过了产业间贸易的“南北贸易”。要素禀赋相似的国家基于专业化和分工而形成的规模经济优势,即是内生比较优势,而这种内生比较优势则是大量的“产业内贸易”的源泉。至于内生比较优势的收益问题,其认为,产业内贸易和专业化能通过规模经济来提高生产效率,所以,在一个以报酬递增为特征的世界里,贸易自由化通过本身的生产效应、生产集中、合理化和多样化四种效应,不用显著地进行资源再配置就增加了潜在得益的来源,从而使贸易各国都得益。

五、杨小凯新兴古典经济学贸易理论

超边际分析贸易理论的倡导者是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杨小凯、张永生(2001)认为,传统的贸易理论分析都是以边际分析为基础,只能实现内点解均衡,而无法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而以其为代表的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应以超边际分析为基础,才能实现角点解均衡,从而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从历史来看,贸易理论的发展有两条线索:一条是以斯密为代表的绝对比较利益说,又称“内生比较利益说”;另一条是以李嘉图为代表的相对比较利益说(又称外生技术比较利益说)和赫克歇尔——俄林为代表的要素禀赋比较优势说。

* 赫尔普曼、克鲁格曼(1985):《市场结构和对外贸易——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和国际贸易》,尹翔硕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3年中译本第5页

这两条思路的差别并不是简单的内生与外生比较利益的差别,它们本质上代表着经济学不同的发展思路。前者关注分工网络模式等经济组织的拓扑性质的变化,而后者则关注资源的分配与流向等非拓扑性质的变化^{*}。杨小凯认为,通过专业化、分工、报酬递增、学习效应、交易效率的提高等可以创造并培植出内生比较优势。因此,杨小凯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出发点和基石是由分工和专业化形成的内生比较优势,而不是李嘉图模型与H-O模型的外生(天生的)比较优势。以内生比较优势为基础,考虑到关税和交易效率的影响,以超边际分析作为分析工具,重新阐释了国际贸易理论,从而形成了新兴古典贸易理论。

杨小凯认为,传统的李嘉图模型、H-O模型把外生(天生的)比较优势作为国际贸易的原因与出发点,其基本的分析工具为新古典的边际分析,两者均未考虑专业化与分工的作用、关税与交易效率的影响,因此,需要用新兴古典经济学的超边际分析对之进行进一步发展。在2*2的李嘉图模型中,假定国际贸易的两国为局部分工,一国(国家1)是半专业化的生产两种商品的大国,一国(国家2)是完全专业化的生产一种商品的小国;如果两国都对进口品征收关税,则会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国家1因为具有某种垄断力量,通过征收关税改善了本国的贸易条件,提高了本国的福利。而国家2征收关税,只会使本国进口品价格提高,不会改善本国的贸易条件,还使本国福利下降。所以在国家1和国家2的关税博弈中,最后的纳什均衡为:国家1是实行尽可能以增加本国居民的福利,只要关税水平不至于使国家2退出国际贸易;而国家2的最优选择为关税为零的自由贸易政策。如果分工由局部分工演化为完全分工,则两国通过关税博弈,最后的均衡为纳什关税谈判均衡,双方都实行自由贸易政策。这一点也可以由GATT、WTO的发展历程所验证。随着分工的深化,交易效率的提高,双边与多边关税谈判都在增加,关税逐步减让、NTBS逐步消除的贸易自由化将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如果将关税引入三国李嘉图模型,可以证明,当所有政府都可以选择关税水平且一般均衡是局部分工时,则关税很高且交易效率低的国家将被排除在国际贸易之外。如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现在的朝鲜等国。所以在多级世界经济体系中,各国都努力削减关税、提高交易效率,以避免被开除出局。交易效率的提高一方面促进了分工的深化,规模经济的扩大,可贸易商品种类和数量的增加;另一方面,也使参与国际贸易的国家数量增多,保证了多边自由贸易体制的实行,即使现在仍是局部分工,尚未达到完全分工。至于H-O理论,杨小凯以分工为主线,随着自给自足——局部分工——完全分工的分工逐步深化,交易效率的逐步提高,均衡状态也在不断变化,以之为基础,杨小凯重新阐释了2*2的H-O模型。其认为,“这种分工和贸易依存度的演进过程,提高了均衡的总和生产水平”^{**}。

对于随着贸易数量增加而越发导致贸易条件恶化的贫困化增长,杨小凯认为,只要改善交易条件,提高交易效率,发展中国家就可以走出贫困化增长的“比较优势陷阱”。因为交易条件的改进,交易效率的提高会使分工深化,促进生产的专业化与规模经济,扩大分工网络,从而提高均衡的总和生产水平,以至生产力提高的好处能超过贸易条件恶化的坏处。

六、简要述评

实际上,克鲁格曼的国际贸易新理论、杨小凯的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与汉密尔顿、李斯特、穆勒的幼稚产业保护论是一脉相承的,保护只是手段,培植一国的生产力才是目的,其基本出发点都在于内生比较优势的培植和创造。笔者认为,内生比较优势的创造如同幼稚产业的保护,在这个过程中,可以运用关税与非关税壁垒等多种保护手段,使产业通过专业化分工、规模经济和市场份额拓展形成良性互动,形成某种垄断优势,更好地参与国际产业分工与竞争。“封闭市场起到加快本国在该产业相对(与外国相比)生产率的发展速度的作用。如果保护的时间非常长,这种相对生产率的发展会足以使本国的产品1具有成本优势。这时,保护开始变成无关紧要,贸易政策已经实现了比较优势的永久性转换。对于一个具有大量劳动力但工资较低的国家来说,使用暂时的保护形成比较优势的转换似乎成效极佳”^{***}。对于中国这样的一个具有大量劳动力的发展中大国,内生比较优势的创造尤为重要,如果一直按照H-O-S定理、FPE定理的外生比较优势去参与国际分工与交换的话,中国就很难走出“产业结构低度化”的比较优势陷阱。不过,在工业化初期,李嘉图的相对比较优势理论、H-O的要素禀赋理论还是有其积极意义的。比如,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正如林毅夫等(1994)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中所述,中国放弃了扭曲要素价格与相对比较优势的重工业化发展战略,采取能够发挥其相对比较优势的农业与轻工业并举的发展战略,在改革开放初的一段时期,取得了较好的发展效果。但是,随着经济发展进入后工业化时期,必须较快实现由外生比较优势向内生比较优势的转换,否则,就无法顺利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大量企业的破产与产业衰退的现象就无法避免。我们认为,中国在加入WTO以后,在入世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关税改革和产业结构、劳动力调整过程中,应该把内生比较优势与外生比较优势有机接合起来,努力使相关的关税改革趋向于帕累托改进,并尽快实现产业结构和劳动力结构的优化。

[参考文献]

* 杨小凯、张永生(2001):《新贸易理论、比较利益理论及其经验研究的新成果:文献综述》,《经济学季刊》第1卷第1期

** 杨小凯、张永生(2000):《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61页

*** 克鲁格曼(2001):《克鲁格曼国际贸易新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106页

跨越贸易壁垒的新途径:对外直接投资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李 有

[摘要] 在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贸易壁垒日趋严重的情况下,我们急需寻找跨越贸易壁垒的有效方式。分析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可以有效地扩大母国的出口,对外直接投资成为了各国绕开贸易壁垒的有效方式。大举对外直接投资,以投资带动贸易是我国未来贸易发展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 贸易壁垒,对外直接投资,出口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贸易地位的提升,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国的贸易摩擦越来越多,这主要反映在层出不穷、形式多样的贸易壁垒上。各主要贸易国频繁地对我国实行的反倾销、技术性贸易措施和保障措施等重重贸易壁垒对我国企业的外贸出口造成了巨大损失,也对我国主要依靠出口和引进外国直接投资来推动经济增长的战略带来了巨大挑战。如何跨越贸易壁垒自然成为人们关注和研究的重点,理论界也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然而,在我们看来,这些办法乃是一种被动的策略,因而效果并不明显。要有效地跨越贸易壁垒,我们需要主动出击——对外直接投资。绝大多数的研究表明,对外直接投资能够提高东道国的出口竞争力,服务于我们的目的,我们需要从另外一个方向——从母国的角度来研究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的关系。

一、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出口的理论分析

Mundell(1957)利用H-O-S(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模型得到了对外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的替代关系,但是,H-O-S模型的假设条件过于严格,特别是它假设两国的生产函数相同,因而其结论与现实相差太远。Kojima, K. (1979)认为对外直接投资是资本、技术、经营管理和人力资本的总体转移,所以直接投资是以两个国家存在不同的生产函数为前提,国际贸易是按既定的比较成本优势进行的,对外直接投资应依照比较劣势原则进行,母国对外直接投资应从本国处于比较劣势的边际产业开始依次进行,这样,母国便可以集中精力创造和开发出新的技术和比较优势,从而更大规模地推动母国出口。跨国公司是对外直接投资的载体,Helpman(1984,1985)、Helpman和Krugman(1985)、Markusen(1997)在不同于传统贸易理论的假设条件下(如规模经济、寡头垄断、战略性行为)将纵向一体化和横向一体化跨国公司理论纳入国际贸易理论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分析表明,在纵向一体化条件下,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跨国公司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中间产品的出口和进口,要素禀赋差异越大,这种出口和进口的规模越大;在横向一体化条件下,跨国公司的多区位投资和生产能为企业带来规模经济,国家间的相似性越高,则市场规模、要素禀赋和技术效率的优势就越大,公司就越有可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从而扩大产业内贸易。在横向一体化和纵向一体化共存的情况下,总部所在的知识资产能够低成本地从总部向各国工厂转移,直接促进了知识资产等中间产品的出口;总部所从事知识的创造与生产,常常能够导致新产品的诞生,从而扩大了母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因而,对外直接投资不仅可以扩大母国的出口,而且引起了母国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

竞争优势理论认为,跨国公司根据其自身优势,按照其综合和长期战略利益的要求和比较优势的原则,将其价值链分布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跨国公司不仅采用传统地将整个产业都抛出去的产业转移方式,而且还将原来集中于一个企业内的基本生产过程乃至生产过程的不同工序也部分地转移到其他国家或地区,从而增强其竞争优势。因而,对外直接投资扩大了产业间贸易、产业内贸易和公司内贸易,优化了出口商品的结构。

近年来,产业网络理论受到了西方学者的普遍关注,产业网络理论认为,企业在国际化的进程中可以从以下三个层次拓展其经营活动:将企业的经营活动延伸到其他国家,并建立相应的产业网络;利用企业在某个国家建立的网络关系,向该国市场作进一步渗透;增强在不同的国家建立起来的网络之间的协调性,也就是说,建立网络的国际一体化。同时,对外直接投资和贸易在一个网络中使用的是相同的网络资源,因而,一旦网络建立起来,投资的增加就会伴随贸易的增长。

对外直接投资可能会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增长,从而推动东道国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消费能力的增强,最终增加东道国对母国商品的进口。另外,跨国公司在国外的直接投资倾向于从母国进口其投资企业所需的各种资本品、零部件及相关服务,由此带动母国出口的增长;一家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带动与其相关或配套

[1] 赫尔普曼、克鲁格曼(1985):《市场结构和对外贸易: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和国际贸易》,尹翔硕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3年中译本

[2] 克鲁格曼(Krugman,1990):《克鲁格曼国际贸易新理论》,黄胜强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中译本

[3] 克鲁格曼(2000):《战略性贸易政策与新国际经济学》,海闻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李斯特(1997):《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商务印书馆

[4] 林毅夫、蔡、李周(1994):《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

[5] 斯拉法(1997):《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